

“接入·切换·游牧”：大模型语境下 用户的多平台使用行为研究^{*}

——兼论其治理启示

姚俊臣 夏以柠 张洪忠

【摘要】 研究基于可供性视角,借助焦点小组访谈法,揭示了用户从“平台接入”走向“平台切换”再到“智能游牧”的多平台使用行为:接入大模型平台时,用户受到主被动因素影响,逐步建立对大模型可供性的认知基础;随后,用户在多个平台展开“切换”,通过跨平台可供性的选择、比较、适配实现效用最大化;切换并非终极目的,用户仍希望于流动中打造稳定关系,并在稳定中寻求流动补偿,以实现实用化、个性化的数字栖居。用户的“接入·切换·游牧”本质上是持续追寻可供性资源的过程,这一点亦呼唤着智媒时代平台治理模式的转型。

【关键词】 智能传播 复媒体环境 可供性 大模型 多平台

【作者】 姚俊臣(1999—),男,江苏连云港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日报社见习记者。夏以柠(2000—),女,吉林长春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智能传播。张洪忠(1969—),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智能传播。

中图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602-(2026)01-0152-17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11月底推出的大语言模型(以下简称“大模型”)平台ChatGPT在两个月内就吸引上亿月活用户。随后, MidJourney、豆包、DeepSeek等大模型平台亦不断涌现,且在技术架构与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增强中华文明海外网络传播力影响力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A094)的阶段性成果。

创新扩散路径上表现出趋同性，如技术框架高度一致、^{〔1〕} 界面标准化处理等。^{〔2〕} 在大模型生态日渐多元化的背景下，用户是如何使用这些平台的？对此，常见的研究思路是从单一平台切入予以讨论。^{〔3〕} 事实上，多元化平台的共在提供了一个相互交织、自由选择的“复媒体环境”（polymedia environment），用户可按照自己的需求与偏好配置个人媒介菜单（media repertoires），^{〔4〕} 即对“多种媒介可供性的选择性调用”。^{〔5〕} 2024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指出，有65.2%的媒体从业者使用过大模型平台，其中又有61.37%的从业者使用超过1种大模型平台。^{〔6〕} 然而，对多平台使用行为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用户短时“切换”或“摇摆”（switching/swinging）的行为表征，还需对用户配置多平台的历时性特征展开深挖细描。用户为何接入、使用多个大模型平台？用户如何与大模型平台建立联系，又将之运用于哪些场景？多平台使用行为有什么特征，对用户来说有何意义？本研究旨在从可供性视角出发，运用焦点小组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展开剖析。

二、理论基础

（一）复媒体环境及其延伸

“复媒体环境”最早用于刻画全球移民家庭内部通过电子邮件、社交网站等的协同使用来营造共在感（co-presence）。^{〔7〕} 作为一种阐释视角，复媒体强调相关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以及媒体架构等要素组成的综合作用，^{〔8〕} 重点考察用户在一个整合的媒体环境中取长补短的使用方式。多项研究已证实，复媒体环境中，用户“栖息”在多个平台上，按照自身需求选择平台并组合使用。^{〔9〕}

有学者指出，可供性是分析复媒体框架的关键性维度，^{〔10〕} 是用户在复媒体环境中可以利用的东西。^{〔11〕} 例如，Facebook被认为是用户公共化的形象展示空间，而Instagram更倾向于展示风格化的自我形象。^{〔12〕} 在国内，微博是用户展演真实自我、寻求情感释放的首选平台，而对于小红书，

〔1〕 Ashish Vaswani et al.,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7, pp.6000–6010.

〔2〕 Jakub Bieniek, Mohamed Rahouti & Dinesh C. Verma, *Generative AI in Multimodal User Interfaces: Trends, Challenges, and Cross-Platform Adaptability*, arXiv:2411.10234, 2024.

〔3〕 Adrian Strzelecki, *To Use or Not to Use ChatGPT in Higher Education? A Study of Students’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Vol.32, No.9, 2024, pp.5142–5155. 张海、刘畅、王东波、赵志泉：《ChatGPT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4期，第15–22页。

〔4〕 喻国明：《中国居民的媒介使用图谱：全民媒介使用与媒介观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

〔5〕 Mirca Madianou & Daniel Miller, “Polymedia: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16, No.2, 2013, pp.169–187.

〔6〕 徐鸿晟、张洪忠、姚俊臣、林润：《我国主流媒体应用AI大模型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载《中国编辑》2025年第2期，第24–33页。

〔7〕 Mirca Madianou & Daniel Miller,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13.

〔8〕 Mirca Madianou, *Polymedia Life, Pragmatics and Society*, Vol.12, No.5, 2021, pp.859–866.

〔9〕 李媛媛：《数字游牧民：复媒体环境中的社交媒体平台摇摆研究》，载《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第27–34+98页。

〔10〕 Mirca Madianou & Daniel Miller, “Polymedia: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16, No.2, 2013, pp.169–187.

〔11〕 Mirca Madianou, *Smartphones as Poly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19, No.3, 2014, pp.667–680.

〔12〕 Pablo J. Boczkowski, Mora Matassi & Eugenia Mitchelstein, “How Young Users Deal with Multiple Platforms: The Role of Meaning-Making in Social Media Repertoir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23, No.5, 2018, pp.245–259.

只有在用户认为其适合自我表达时,才会将之用作情感释放的窗口。^[13]

AI技术驱动的大模型平台实现了搜索、社交、流媒体与生成式媒体的智能融合。用户可以在一个高度集成化、具有“复媒体属性”的平台上,完成多重社会活动(例如,豆包等大模型平台通过知识问答、文本生成、情感交互等功能可供性,支持用户的一站式需求);而大模型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平台形式,扩展了复媒体的边界。在此情况下,用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跨媒介能力,能够更加灵活地调度不同平台的可供性资源。^[14]由此可见,可供性这一理论视角仍适用于分析大模型驱动的平台使用行为。

(二) 可供性视角下的多平台使用

“可供性”一词由吉布森(James J. Gibson)于1979年提出,定义为“环境为生物体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此概念的亮点在于将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转化为主客体间的耦合,强调物体属性与行动者能力的关系特征。^[15]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关联会被人的知觉直接捕捉,人随即采取对应行为以达成意义。^[16]诺曼(Donald Norman)率先将“可供性”概念引入人机交互领域,指出同一物体的功能感知会因用户体验、文化语境等产生明显分化。他区分出真实可供性(real affordance)与感知可供性(perceived affordance),认为设计者可借操纵物理限制、符号意指、群体规范与认知惯性四层框架,调节用户对技术的感知路径。^[17]换言之,可供性促成的行动“不仅依赖于环境/物固有的属性,还依赖行动主体的感知能力”。^[18]

在社交媒体背景下,鉴于不同平台差异化的技术架构、目标群体和文化规范,用户平台使用有极强的语境驱动性,可能在一个平台活跃,而在另一个平台潜伏。^[19]Ronzhyn等人将可供性界定为“实际感知到或想象到的社交媒体属性,通常以技术、社会和语境的关系出现,既促成也制约着平台使用行为”。^[20]该界定强调了语境因素在用户平台实践中的关键作用。此外,对语境的考察不仅涉及平台内部微观语境的动态演变,还要关注宏观社会结构、组织规范和文化背景如何嵌入并形塑用户的使用实践。

当前,已有研究将上述维度应用于大模型分析。就关系性维度而言,用户会向平台投射工具使用型关系、代理型关系和伴侣型关系等。^[21]大模型功能在变化,会引发相应关系感知的变化,从而

[13] Xueying Wang, Meng Chen & Wei Jiang, “Why Is One Social Media Platform Not Enough? A Typology of Platform-Swinging Behavior and Associated Affordance Preferences”, *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10, No.2, 2024, pp.1-13.

[14] Xiangxiang Dai, Jin Li, Xutong Liu, Anqi Yu & John C.S. Lui, *Cost-Effective Online Multi-LLM Selection with Versatile Reward Models*, arXiv:2405.16587, 2024.

[15] James J. Gibson,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 1966, p.285.

[16] 罗玲玲、王磊:《可供性概念辨析》,载《哲学分析》2017年第8卷第4期,第118-133+200页。

[17] Donald A. Norman, “Affordance, Conventions, and Design”, *Interactions*, Vol.6, No.3, 1999, pp.8-43.

[18] 陈秋心、邱泽奇:《“人机互生”时代可供性理论的契机与危机——基于“提示词”现象的考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4卷第5期,第172-182页。

[19] Jeffrey W. Treem, Paul M. Leonardi & Bart Van den Hoof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Communication Visibility”,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25, No.1, 2020, pp.44-59.

[20] Alexander Ronzhyn, Ana S. Cardenal & Albert Batlle Rubio, “Defining Affordances in Social Media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 *New Media & Society*, Vol.25, No.11, 2023, pp.3165-3188.

[21] 张洪忠、任昊桐:《超越“第二自我”的人机对话——基于AI大模型应用的信任关系探讨》,载《新闻大学》2024年第3期,第47-60+118-119页。

在多平台使用中激活新的可供性形式；就感知性维度而言，受个体经验、认知水平等因素影响，用户对大模型的理解和服务能力感知并不相同。例如，提示工程师和普通用户对同一大模型可供性的感知就存在显著差异；^[22] 在语境性维度，大模型内在结构与外部语境均存在细微差别，这种差异使其能够适配多样化的应用场景。^[23] 然而，作为“生成性媒介”（generative medium），大模型会在不断流动的关系、感知、语境中为用户提供动态可供性支持，而用户在不同平台的切换、摇摆又会引动这种动态可供性支持的变化，因此，须以关系性、感知性、语境性三个维度勾连起“单平台接入—多平台使用”的框架，考察不同平台可供性如何为历时性的智能传播实践创造条件。

三、研究设计

本文以焦点小组访谈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这是因为质化研究相较量化研究更加关注参与者的具身体验，并能有效“发现参与者的意义建构以及理解方式”。^[24] 焦点小组还能凭借互动性激发受访者思维碰撞，催生更为丰富的心得、感受。2024年12月，研究者从高校教师、大学生、媒体从业者中招募受访者。高校教师与大学生通常能灵活多样地使用新技术，体验较为丰富；媒体从业者有较高的社会敏感度，且有提升效率、丰富内容、强化效果的客观需要，^[25] 愿意尝试新技术。研究通过滚雪球方式增加访谈对象数量，旨在匹配同质性较强和组规模较小的讨论。这是执行焦点小组访谈的关键。^[26]

（一）数据采集

研究累计招募30名受访者，其中男性20名，女性10名，年龄从20岁~50岁不等，所有受访者均使用超过1个大模型平台。研究分2组线上（腾讯会议）和3组线下（高校研讨室）展开半结构化的焦点小组访谈，每组6人。在DeepSeek发布后，研究者又通过电话补充了部分访谈资料。访谈中涉及隐私问题均填写知情同意书并予以加密。详细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信息表

编号	年龄	性别	职业	组序	使用工具（部分）
F1	24	女	高校学生	G1	ChatGPT、文心一言、豆包等
F2	50	女	媒体从业者	G1	豆包、WPS AI
F3	28	男	高校学生	G1	ChatGPT、星火、智谱 GLM 等
F4	34	男	媒体从业者	G1	Kimi、智谱清言、豆包等
F5	26	男	高校学生	G1	ChatGPT、智谱清言
F6	29	男	高校学生	G1	ChatGPT、文心一言、豆包等
F7	26	男	媒体从业者	G2	文心一言、豆包、Kimi

[22] 陈思羽、王启臻、张洪忠：《提问的艺术：大模型提示工程的可供性分析》，载《现代出版》2025年第4期，第61—72页。

[23] Nicola Lorè & Babak Heydari, “Strategic Behavior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the Role of Game Structure Versus Contextual Framing”, *Scientific Reports*, Vol.14, No.1, 2024, p.18490.

[24] Peter Lunt & Sonia Livingstone, “Rethinking the Focus Group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46, No.2, 1996, pp.79—98.

[25] 范以锦：《人工智能在媒体中的应用分析》，载《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2期，第60—63页。

[26] Isabella McLafferty,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s a Data Collecting Strategy”,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Vol.48, No.2, 2004, pp.187—194.

编号	年龄	性别	职业	组序	使用工具(部分)
F8	25	男	高校学生	G2	ChatGPT、豆包、Kimi等
F9	27	男	媒体从业者	G2	文心一言、豆包
F10	20	女	高校学生	G2	ChatGPT、Kimi、Claude等
F11	40	女	媒体从业者	G2	Kimi、酷熊、智谱清言等
F12	27	男	高校学生	G2	智谱清言、文心一言和豆包等
F13	28	男	高校学生	G3	ChatGPT、DeepSeek、豆包等
F14	32	男	媒体从业者	G3	豆包、ChatGPT、海螺等
F15	29	男	媒体从业者	G3	Stable Diffusion (SD)、飞书等
F16	40	男	媒体从业者	G3	ChatGPT、Claude、通义等
F17	25	女	高校学生	G3	Kimi、豆包、DeepSeek等
F18	32	男	高校教师	G3	ChatGPT、星火、豆包等
F19	45	女	高校教师	G4	Kimi、Claude、ChatGPT等
F20	32	男	高校教师	G4	ChatGPT、Talk AI、Newbing等
F21	36	男	高校教师	G4	ChatGPT、文心一言
F22	35	女	高校教师	G4	WPS AI、文心一言、豆包等
F23	30	男	高校教师	G4	ChatGPT、Newbing、豆包等
F24	29	男	高校教师	G4	ChatGPT、豆包、DeepSeek等
F25	28	女	媒体从业者	G5	图知道、Kimi、豆包等
F26	36	男	媒体从业者	G5	ChatGPT、Kimi、豆包等
F27	35	女	媒体从业者	G5	剪映AI、即梦
F28	31	女	高校教师	G5	ChatGPT、Kimi、豆包等
F29	32	男	高校教师	G5	豆包、MidJourney、SD等
F30	30	男	高校学生	G5	ChatGPT、豆包、DeepSeek等

实施流程上,研究者担任主持人,邀请北京某高校两名研究助理担任记录员,遵循开放性、平等性、相关性和深度性原则,邀请受访者分享自己的见解、行为与体会,问题主要包括:(1)大模型平台的早期接入与长期使用;(2)多平台使用行为与感受;(3)多平台的使用结果和影响。考虑到焦点小组访谈可能出现的从众、个体意识被遮蔽的情况,^[27]访谈设置发言顺序游动调换、受访者自行补充等环节。每组访谈时间持续2.5~3小时,最终获得21万余字的文本以供分析。

(二) 数据预处理与扎根分析

研究者邀请2名研究助理参与数据预处理。在保证文本和语义完整的基础上,(1)删除材料中的冗余表达;(2)对文本中可能涉及因果倒置、逻辑谬误等情况进行标注并附修订意见;(3)结构切割,采用自写Python程序将所有焦点小组访谈文本以“。”为分句标准,切割出30位受访者的2668条数据,并在每段表述前标注受访者编号,以供分析。

研究采用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等人发展出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分析材料,旨在从经验数据中归纳类别和主题,最终形成抽象理论。^[28]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者对原始文本进行详细的逐句分析,提取初始信息,进而

[27] Janet Sim, "Collecting and 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Issues Raised by the Focus Group",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Vol.28, No.2, 1998, pp.345-352.

[28] 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1998, p.57.

归纳整合出 465 个开放式编码关键词；主轴编码阶段，旨在找到开放式编码之间的关系，确定“技术与模型”“平台与公司”“功能与场景”“可供性支持”“用户行为、态度与评价”以及“使用结果与反思”6 个主范畴及对应的子范畴（见表 2）。最后，在“可供性支持”主范畴下，细致勾勒用户从单平台接入到多平台使用的大模型平台使用框架。

（三）饱和度与可靠性检验

研究采取等距抽样的方式将焦点小组访谈获得的数据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 80% 的数据构成，充当数据组；另一部分由另 20% 的数据构成（即 F5、F10、F15、F20、F25 和 F30），充当检验组，用于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组提取的 86 个开放式编码关键词均可在数据组中复现，没有发现新的概念或类别，符合理论饱和原则，不再新增访谈数据。

可靠性检验主要由编码员内部的一致性，编码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概括性和可追溯性等指标构成。^[29] 研究按照近似 10% 的原则抽取了 250 条数据，由 3 位编码员以李克特 5 分制量表检验开放式编码可靠性。结果发现，3 名编码员之间两两一致性得分均超过 0.800，表明编码员内部一致性较高。就编码内容来看，四项得分均值皆高于 4.400，误差分布见图 1，可知编码员对扎根编码整体认可度较高，结果较为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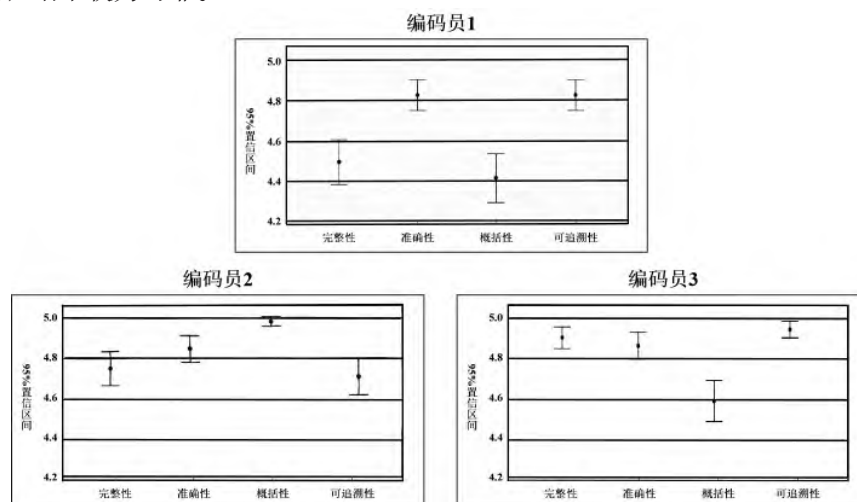


图 1 三位编码员对扎根编码结果评价的误差箱线图

表 2 扎根编码结果

主范畴	子范畴	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关键词（部分）
技术与模型	技术架构	数据要素	数据来源、数据训练、数据库支持、数据规模
		底层技术	大模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插件
	模型应用	模型类型	通用大模型、垂类模型、专用模型、小模型
		应用方向	多模态、对话能力、模块化应用、语音交互
平台与公司	平台	国内平台	豆包、通义千问、智谱清言、Kimi
		国外平台	ChatGPT、Claude、Bing、MidJourney
	公司	国内公司	百度、字节跳动、腾讯、科大讯飞
		国外公司	OpenAI、Microsoft、Google、Meta

[29] Juliet M. Corbin & Anselm Strauss,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13, No.1, 1990, pp.3–21.

主范畴	子范畴	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关键词(部分)	
功能与场景	工具属性	办公写作	论文写作、报告撰写、文章润色、文字翻译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市场分析、趋势分析、趋势探索	
		创意生产	图片生成、动画生成、视频剪辑、报道可视化	
		技术开发	代码生成、技术开发、代码调试、bug修复	
		专业服务	法律咨询、教学辅助、媒体管理、实验设计	
	娱乐属性	社会交往	聊天工具、休闲娱乐、伴侣、情感陪伴	
可供性支持—单平台接入	关系层面	技术兴趣	自主探索、技术跟踪、技术认同	
		交互成本	接入门槛、地域限制、账号限制	
	感知层面	技术感知	新质生产力、技术形态、变革性技术	
		效能感知	对话功能、响应速度、界面设计	
	语境层面	个人压力	社交焦虑、落伍、教学压力	
		行业生态	行业变革、公司背书、媒体危机	
可供性支持—多平台使用	关系层面	技术习惯	使用习惯、使用偏好、思维定势	
		交互成本	订阅成本、切换代价、学习成本	
	感知层面	服务能力感知	准确性、专业性、创造性	
		服务效率感知	感知延迟、响应速度、稳定性	
		平台功能感知	语料丰富度、代码能力、多模态能力	
	语境层面	平台组件感知	本地知识库、历史记录、联网搜索	
平台适应		封号风险、敏感信息、泄露风险		
组织适应		单位规定、领导要求、开票报销		
社会文化适应	社会文化适应	社会价值观、中英文语境		
	用户行为、态度与评价	使用行为	使用模式	使用习惯、使用方式、主动使用、被动使用
		使用态度	情感态度	积极态度、消极态度、怀疑态度、态度开放
使用评价		体验评价	大模型信任、接受度、使用体验、满意度	
使用结果与反思	正向结果	效率提升	提升工作效率、省时省力、一键翻译	
		质量提升	辅助创意思路、拓展创作可能性、纠正语法错误	
		能力提升	增强研究能力、拓展知识边界、生成新观点	
	负向反思	平台依附风险	平台垄断、生态封闭、算法偏见、信息茧房	
		个人能力退化	干扰自主思考、创新困难、翻译能力退化	

四、模式初探：主被动因素影响下的平台接入

(一) 关系缔结：大模型平台两波接入潮

ChatGPT自2022年11月推出后引起广泛关注，激起了使用方法、注册指南、技术术语的讨论潮，也掀起了第一波大模型平台接入潮。有超过2/3的受访者于此时接入大模型平台。

我第一次听说大模型是在2022年末，当时ChatGPT成为热议话题。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于是就开始接触了。(F12)

2023年2月，国内有关大模型的讨论热度进一步走高，相关话题延伸到国内产品、市场投资等。2023年下半年，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公司纷纷推出旗下大模型平台，为用户提供新的接入机遇。

我是在2022年ChatGPT发布的时候就了解到有这个东西，然后身边年轻的同事也马上下载试

用了。但我年纪大了，只是在旁边看看，直到2023年国内的豆包出来了，我才开始接触。（F2）

对国内用户而言，第一波接入潮有着物理层面可供性断裂的特点：直接访问 ChatGPT 等国外大模型平台需要突破海外手机号注册、国际信用卡付费等一系列限制，还需要忍受频繁的登录失败及操作难题；而部分单位、地区的政策法规和社区文化明令禁止使用国外大模型平台，亦构成了另一物理层面的可供性障碍。用户只得在第二波接入潮中转向国内平台，寻求认知与功能的补偿。

我第一次接触的大模型也是 ChatGPT，由于账号问题，我借别人的账号使用，后来经常登不上，就不太想用了，所以现在更多使用国内的平台。（F22）

（二）功能探索：工具属性为主，娱乐属性渗透

接入行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还要围绕具体的功能实践展开。用户通过交互不断探索大模型功能，逐步建立起对大模型技术潜力与边界的感知，完成可供性从“想象”到“体验”的转变。研究归纳出办公写作、数据分析、创意生产、技术开发、专业服务、社会交往六种主要的应用场景（见表2）。受访者中，仅有 F3、F4 和 F10 表示有“玩”大模型平台的经历。这有别于社交媒体平台以社交互动、娱乐休闲为主的功能特征^[30]，而是呈现出“工具属性为主，娱乐属性渗透”的特点。

大模型平台的工具价值首先体现在办公写作辅助领域。其直观的交互界面与高效的内容生成能力，使用户能够快速完成文本创作、语言润色和多语种翻译等任务，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并降低了时间成本。

有时候采访的稿件需要大模型辅助写作，主要是让它起提示作用，新闻稿还是我们自己写，写完后会让它帮忙润色。（F28）

一些进阶、迭代的大模型平台则突破基础对话功能，能够处理复杂数据任务，包括数据清洗、分析建模和趋势预测。尤其在一些支持多模态内容的平台上，非专业人士也能发掘数据潜在规律并完成可视化呈现。

有老师讲到在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中，记者利用网络开源数据集，通过 AI 分析寻找故事线索的例子，这为新闻业提供了新方向。（F23）

一般认为，大模型不能产生创造性见解，无法超越人类现有知识的边界^[31]。但本研究认为，与大模型交互能够有效激发用户灵感、突破个体认知边界。这种创造性既非单纯算法输出结果，亦非完全由人类主导，而是人机交互中持续涌现的可供性作用使然。

在周刊制作中，如果有一些老师拍不到或者想不到的画面素材，我们会尝试用 AI 生成，然后再一步步完善成想要的画面。（F15）

相较于对话聊天等基础功能，专业人士通过调用 API 接口、调整提示词等方式，挖掘大模型平台代码生成、漏洞修复等高级功能，使之成为有潜力的技术组件，一定程度上显化了大模型内隐的技术可供性。例如，F20 分享了将“代码生成”应用于教学场景的经历，获得了 F21、F23 的高度评价。

[30] Xueying Wang, Meng Chen & Wei Jiang, “Why Is One Social Media Platform Not Enough? A Typology of Platform-Swinging Behavior and Associated Affordance Preferences”, *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10, No.2, 2024, pp.1-13.

[31] 刘海龙、连晓东：《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 与传播研究》，载《新闻记者》2023 年第 6 期，第 11-20 页。

在我讲授的课程中,我会花两周时间教学生安装 anaconda 和 R 语言。以前对于文科背景的学生来说,安装这些软件并成功运行代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现在有了 GPT 等相关工具后,学生们 20 分钟左右就能自己搞定。(F20)

在法律、医学、教育等领域,大模型通过整合专业数据,实现特定任务的智能化处理,如法律条文解析(F9)、临床决策支持(F20)和教学资源整合(F25)等,展现出更为垂直的专业服务能力。

我有一次跟一个在上海做垂类法律平台的同学聊天时,他提到他们平台的核心业务是输入大量的法律案例和条文,建立大数据智能平台,这让我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业的影响非常大。(F9)

除工具性功能外,大模型在特定情境下能建构知心伙伴、心理咨询师或情感伴侣等角色关系。这种互动既包含人机准社会交往特征,也反映了用户通过技术交互获取社会资本的心理诉求。

有时候使用体验不好,我也会把它只当作一个聊天工具来玩玩。不过我还是可以和朋友分享一些和大模型聊天很有趣的事情。(F4)

(三) 影响机制:多重因素驱动下的大模型接入

1. 技术兴趣主导下的关系建立

研究显示,个体对大模型平台的初始使用行为主要受技术兴趣驱动。这一现象验证了“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观点,即人的自主性、好奇心是影响人类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动机。^[32] F3、F6 等早期使用者对大模型的接触始于对技术的前瞻性想象,或者说是“想象的可供性”使然。^[33] 即在实践前就对大模型形成一定的认知与期望,并塑造了之后如何接近、使用该技术。

我最早了解到大模型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个人对人工智能和大模型这些新技术比较感兴趣,其实和 X 老师(注:F6)一样,就是在 2022 年上半年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前期的报道。我想看看到底它是一个什么妖孽,因为那个时候一出来大家都在吹。(F3)

不过,用户技术水平并非关系建立的必要前提。大模型平台通过将复杂算法转化为直观、即时的交互界面主动抹平技术壁垒,不断降低可供性的认知与实践难度,使用户较为轻松地建构人机关系,直接体验大模型的核心功能。

我第一次接触大模型是 ChatGPT 推出的时候,那时我还在海外读博士,使用大模型完全没有门槛,也没有特别强烈的使用需求,就是体验一下新事物。(F23)

2. 宏观叙事与具身体验的感知叠合

从感知维度来看,大模型平台的接入源于宏观叙事与自身实践的双重作用。当“新质生产力”(F4)、“变革性技术”(F2)等技术叙事通过媒介传播形成社会共识时,用户逐渐将大模型理解为突破工作、学习困境的潜在技术方案。

[32] Edward L. Deci & Richard M. Rya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Macro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Health”,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Vol.49, No.3, 2008, p.182.

[33] 王競一、张洪忠、斗维红:《想象的可供性:人与元宇宙场景关系的分析与反思》,载《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4期,第70-78页。

我们单位是抱着一种探索的心态来理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大模型，鼓励大家都去使用，从而提升我们的报道水平。（F4）

另一方面，具体场景的应用实践深化了用户对大模型效能的感知。F11 处理报纸转视频任务时，从“根本搞不来”到借助大模型顺利完成，反映了技术可供性感知真正服务于用户实践。F20 在毕业论文中采用大模型处理数据的案例也表明，当技术能力超越人类能力边界时，用户会主动选择技术并将之视作生存之必需，以期从传统、繁重的工作流程中寻求解放。

我大概是从 2022 年开始接触大模型，当时是工作需要。我们需要把报纸文章转换为视频，我根本搞不来，因此使用了生成视频的 AI 工具。（F11）

我第一次接触大模型是在 2023 年 2 月，当时我在写毕业论文，急需大模型帮我做监督式机器学习。当时推文数量有 500 多万，人工编码肯定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当时我就用了大模型，因为不用就可能毕不了业。（F20）

3. 多重语境渗透下的大模型接入

随着大模型逐渐融入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尚未接入的潜在用户通常要承受各方压力，不得不通过接入大模型来调适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外部压力既有可能来自同事、领导等微观层面，也有可能来自更为宏观的行业与组织层面。例如，担忧“技术脱节”而被动卷入技术浪潮的 F2 主动接入大模型以寻求组织认同。

毕竟这一次真的是新一轮的媒体革命，大家都不愿意在这次革命当中落后了，包括我也是，作为一个老同志，还是觉得不能落后了。（F2）

技术的持续下沉使得一些单位或隐或显地要求员工接入大模型平台，或在招聘公告中提及新的技能需求。在媒体实习的 F10 表示：“我当时的单位对 AI 的态度是很开放的。一开始整个部门就开过一次会，把 AI 辅助直接写进章程，要求所有部门都要用大模型辅助工作。我们是‘结果为上，效率优先’这样一个态度。”

站在更加宏观的社会文化视角中，大模型的接入与一种积极乐观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有学者用“技术崇尚文化”指代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依赖心态。^[34]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会遵循一定的社会脚本（social script）积极跟进、采取行动，“蹭热点”（F5）或“赶潮流”（F18）成为部分用户接入平台的重要原因。

我觉得使用大模型既是一种前沿探索，也是为了蹭热点或者追热点吧，反正大家都一股脑地去尝试。（F5）

借助多维可供性支持，用户主动或被动地接入大模型平台。但各个因素间还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以 F14 为例，作为团队的技术骨干，其最初基于技术热情主动接触大模型，随后却被动卷入技术竞争的赛道之中。

我们做技术的对新技术都有一定的关注。最开始是个人兴趣多一点，思考如何将其应用到工作中。但后面领导、同事也会让你在这方面多带一下，反而有点被动。（F14）

[34] 刘科：《技术恐惧文化形成的中西方差异探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23—28 页。

相反,上文提到的F20,由被动的毕业需要激发的使用需求在日后逐渐演化成为一种主动探索,甚至将大模型平台应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之中。而在媒体实习的F10在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也表示:“大模型非常好用”,从而主动发掘新的可供性潜力,完成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换。因此,在一种显现或内隐的部署条件下,用户感知到大模型可供性可以有效提升工作质效、拓展能力边界,从而激活了后续的多平台使用行为。

五、从一到多:可供性比较下的多平台切换

在接入阶段,用户逐渐建立对大模型可供性的认知基础,形成了初步的“人机协作”模式,但单一平台的可供性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当用户超越单一平台而转向调用其他平台可供性时,便进入了多平台切换阶段。正如上文中F10提到的“结果为上,效率优先”,从接入到切换,用户行为逻辑从“大模型能做什么”转为“哪个平台更适合”。切换阶段反映了人机交互不断磨合、调适的过程,本质是用户认知框架与平台技术特性持续互构的产物^[35]。而切换原因亦可从关系、感知、语境三重可供性维度展开剖析。

(一) 人机关系互构中的平台选择

在切换阶段,用户与大模型的关系呈现出双向建构的特征:用户通过实践不断感知技术可供性,技术特性亦随迭代及用户适应而动态调整。就用户实践来看,在“接入”阶段,用户会形成一定“路径依赖”式的技术使用习惯并与特定平台高度“绑定”。不过,这种“绑定”并非枷锁,用户仍然享有“解绑”与“修复”关系的可能。F12长期使用ChatGPT,对其他平台界面的接受程度较低。但后来利用多个平台的博弈,反向优化了自身可得的技术权益。

我最开始使用的是GPT,它是最熟练的工具。但后来GPT推出4.0版本时需要付费,而当时其他搭载了4.0版本的平台,在那个阶段回答问题的能力比GPT还要强,所以我会换一个平台。但是后来,GPT推出4.0的免费体验功能后,我又换回来了。(F12)

平台生态本身也在动态调整,新平台的出现亦会引发既有关系的重构。这一过程中,经济成本(如订阅费用)和认知成本(如学习曲线)成为用户切换决策的关键因素。当新平台的可供性优势显著超越切换成本时,用户就会主动中断原有平台的连接,转向替代性平台。

我有段时间不用ChatGPT,一方面是token限制,另一方面是要氪金,订阅成本确实不低。而当时国内平台,像智谱什么的也可以算是“平替”了。(F3)

(二) 效能感知驱动下的平台比较

在多平台使用场景中,用户会自发形成一套评估框架,用以感知、比较不同平台的服务效能。这一框架通常涵盖服务能力(如准确性、专业性)、服务效率(如响应速度、稳定性)、平台功能(如代码能力、多模态能力)和平台组件(如历史记录、联网搜索)等关键指标(见表2)。与单一平台使用相比,多平台可供性比较的感知维度更加丰富。

如果查询事实性内容,智谱清言联网搜索功能强,会给出答案并提供出处以便验证,这点

[35] 陈秋心、邱泽奇:《“人机互生”时代可供性理论的契机与危机——基于“提示词”现象的考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72-182页。

ChatGPT 不行，因为它的语料在国内可能不太够，而且 ChatGPT 不会提供来源，会有很多假信息。
(F30)

它 (Newbing) 没有左侧或右侧的分类对话或新建对话功能，所有对话都集中在一个页面上。这点不如 ChatGPT。(F12)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比较感知会随着使用场景变迁、用户能力提升和平台技术演进而动态发展，具有鲜明的渐进性。例如，F19 通过反复实践和比较验证，逐步识别出契合任务执行的最优平台；F8 经过长期切换探索，最终确立跨平台使用的最优组合。

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让它们同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然后比较哪个模型的回答更好，再选择合适的答案。(F19)

如果任务不能随便糊弄过去，我确实会几个平台一起用。特别是我用文生文的应用比较多，文字生成质量不太好评估，不像图像有明显的画风区别。我能感觉到豆包的记忆力不太好，但文采好一点；Kimi 记忆力特别好，无论怎么扩展任务，它都能在主线上顺着思路做。所以，如果要反复修改、调试，我就用 Kimi；需要创意的任务，我会用豆包。(F8)

综上，多平台可供性的比较感知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十分显著，甚至直接驱动切换决策。F15 直言不讳地说，“我在多个平台间切换主要是为了比较，看看哪个平台更好”；类似观点在多个受访者 (F10、F19、F26 等) 口中均有体现。这种基于自身感知的“用脚投票”方式推动用户多平台使用向精细化、场景化模式演进。

(三) 多重语境约束下的平台适配

用户使用多个大模型平台，既追求技术效能最大化，也受到平台内部生态等微观语境，以及组织、文化等宏观语境的制约。例如，F12 在使用平台翻译时，牵扯到多重语境的影响，包括国内外平台内部审查机制、数据政策及宏观社会文化差异等。

国内的平台我一般用得不多。之前写一个课题时用了智谱清言，主要是因为我的课题涉及一些关于战争的信息，这些信息在 ChatGPT 中属于敏感信息，它会拒绝翻译，但智谱清言可以。(F12)

平台的适配在社会组织场景中表现得较为显著。以 F14 为例，受单位平台使用报销政策所限，不得不转向使用国内平台；F20 亦因所在地法律法规限制转而使用国内平台。

我之前习惯用一个国外平台做动态效果，但它充值后无法开票报销，所以我就只能转到国内能开票报销的平台了。(F14)

表面上，用户的多平台切换是自主决策的结果，但当技术的“最优解”和现实的“紧箍咒”产生冲突时，用户只得在缝隙中重新定义可供性调用的边界，重新适配技术使用的逻辑。这种切换行为不仅受平台层面的界面友好性、功能完整性等微观因素影响，亦由中观层面的技术生态（维护支持、社区资源、跨平台适配）和宏观制度环境（组织规范、政策法规）共同塑造。这与用户因“信息刺激与吸引”而在社交媒体平台间跳转、切换的行为，^[36] 具有明显差异。

[36] 何康、张洪忠：《用户媒介使用：“高度集中碎片化”与“动态粘性”——基于手机应用切换的实证研究》，载《新闻大学》2023 年第 10 期，第 14-30+119-120 页。

六、“智能游牧”：数字栖居中稳定与流动的平衡

前文表明，当用户面对多个大模型平台时，能够基于平台间差异化的关系特征、感知结果和语境约束，在客观条件允许范围内获得一定程度的平台“切换”自主权。可以说，“切换”是用户在效用最大化与迁移成本间的动态权衡结果。然而，切换并非终极目的。用户在流动的平台中仍然希望形成稳定的认知与使用结构——正如游牧民族虽然居无定所，却可根据水草的生长、分布情况以及季节变化来进行周期性迁徙以对抗生态制约。在大模型时代，用户亦利用平台间的差异化优势突破单一平台局限，实现可持续的数字栖居。

(一) 理解“游牧”：流动中的稳定关系

对游牧民族来说，“家”并非经纬坐标确定的固化存在，而是迁移路径、资源分布、生活习惯共同作用下稳定的流动系统。这种生存法则在大模型语境中具象地表现为：“流动”意味着用户不再固守单一平台，而是能动、自主地在大模型的平台生态中配置与多个平台的关系；“稳定”不仅意味着用户对多平台的可供性熟稔于心，渴望达成“此心安处即吾乡”的稳定状态，也意味着用户试图建构相对稳定的游牧路径，将切换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控的游牧节奏。

肯定会存在平台切换的情况。比如了解到一些新平台和新功能，我就会去尝试使用，因为各个平台有不同的功能侧重。但从心理上来说，我又希望最好有一个平台能可靠地实现所有功能，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来回换了。(F23)

可能我永远也不确定使用哪一个平台，但是有这么多平台可以给我选，就很踏实。(F10)

我现在工作的习惯就是基本上会同时打开 Latex 网站、ChatGPT、文心一言和邮箱，然后再开始工作。(F21)

可见，用户通过持续的可供性比较，将碎片化的技术体验整合为稳定的认知秩序和工作模式，逐渐形成“流动中的稳定关系”。进而，通过与搜索引擎等传统平台的搭配使用，即便感知到大模型平台可供性的断裂与失灵，用户建立的稳定使用关系仍然得以延续。

和以往的搜索引擎相比，大模型有个优势。以前用百度搜索，我得清楚知道自己要搜什么，关键词要很清晰。但现在用大模型，我可以问一些模糊的问题，它给出的结果能让我找到一些关键词或者材料，然后我再针对性地去搜索引擎搜索。(F29)

以上行为模式在研究者身上也可以找到证据——“搜索引擎和大模型是相辅相成的。用大模型‘模糊搜索’查找案例、检索文献很方便，如果信息不全面或对某个地方不确定，可以用搜索引擎进一步核实”^[37]。

(二) “主平台稳定 + 偶发跃迁”：稳定态中的流动补偿

诚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游牧者本身并不追求稳定，而是通过持续的生成(becoming)突破阶级、物种等范畴^[38]。在“流动中的稳定关系”基础上，用户还希望突破原有的可供性感知边界，于稳定态中再次引入流动。

从主任务需求来说，用户倾向于在有限平台内满足核心需求，通过建立“技术舒适区”最小化

[37] 材料来源于研究者笔记，2025年1月5日。

[38]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 Brian Massumi, *Nomadology: The War Machine*, New York: Semiotext(e), 1986, pp.20-25.

时间消耗与认知负担。F29 选择“豆包”作为主平台，源于该平台在智能体开发和多模态交互等场景的适配优势。长期交互形成的“亲密关系”反过来增强了其主平台粘性。

我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是豆包。虽然 ChatGPT 的能力好像比豆包强一些，但是豆包整个平台生态很完整，在 PPT 制作、智能体建设、人偶设计、多模态交互等方面都很合我心意。（F29）

紧接着，F29 承认：“当然，如果遇到比较难的问题，我还是会去问 ChatGPT。”这表明，当主平台可供性无法满足用户或用户产生技术探索需求时，感知可供性差异便成为触发平台迁移的关键因素。

有时候我先用智谱清言画个图或者写个代码，发现效果不好就转向 ChatGPT。（F3）

当我知道哪个平台最适合自己需求后，就固定下来了。目前文字方面就用 Kimi，不会再切换到别的平台。图片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突然有同行、朋友介绍新的大模型平台时，我也想去尝试一下，比如刚刚 X 老师（注：F12）说的 GPT 4.0，我就很有好奇心，想去试试。（F11）

部分用户则通过持续使用多个平台，不断感知、内化技术的可供性边界。例如，F16 区隔化使用国内外平台，并对不同平台的可供性形成了差异化感知，“国外任务用 ChatGPT 以及擅长写代码的 Claude，国内的文心一言则用于文本生成和图像生成”。进而，这种感知促成用户建立起跨平台的流动路径，并在多平台间灵活调配资源，如上文提到 F8 对 Kimi 和豆包的操作流已然形成路径记忆，即在稳定态中反向引入流动。

对于“流动中的稳定关系”“稳定态中的流动补偿”，笔者将之概括为“主平台稳定 + 偶发跃迁”的数字策略。这让用户在多线程工作中借助主平台搭建舒适区，获得“家”的“归属感”并持续生成对大模型技术的掌控感，同时将跃迁当作主平台使用的“补丁”，从中获取新鲜感与补偿感。如此，稳定既不会退化为封闭的茧房，流动也不至于异化为无根的“流浪”（wandering）^[39]。

（三）“定居”：营建智能家园的语境化实践

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有自己的“属地”与“家园”意识，大模型用户在“智能草原”上同样可以基于不同的语境条件，不断优化、调整使用策略，以适应精细化、场景化需求，在流动中保有向下扎根的底色，营建自己的“智能家园”。囿于篇幅，这里以“构建个人提示词（prompt）库”和“个性化定制 workflow”两例略作说明。

1. 构建个人提示词库

提示词是“给系统的指令”，也是“一种编程形式”，由用户自定义^[40]。用户要根据历史对话、上下文语境及时调整表述，以生成持续有效的提示词，也要针对平台、组织、文化开发出适配于不同层次语境约束的提示词模板，使大模型输出的内容合规、可用。用户的技能水平、知识储备和需求场景也各不相同，资深用户会持续积累、优化提示词，通过反复调试扩展其适用范围，最终实现交互效率与输出质量的双重提升。

我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提示词框架了，差不多是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通过一些图片生成

[39] Hongxun Zhao, Jiahui Wang & Xurui Hu, “‘A Wandering Existence’: Social Media Practices of Chinese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Platform-Swinging”, *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11, No.1, 2025, pp.1-15.

[40] Jules White et al., *A Prompt Pattern Catalog to Enhance Prompt Engineering with ChatGPT*, arXiv:2302.11382, 2023.

网站的应用案例,看一下人家是怎么描述的,能生成这么精细化的图片,像皮克斯风格、手绘风格等;还有视角,如透视视角、平视视角、仰视视角;以及场景的氛围感,是轻松愉快还是紧张悬疑等。在使用过程中积累经验就知道,要想生成一张想要的图片,提示词一定要多,而且分不同系列,比如场景的提示词、光线的提示词、视角的提示词以及氛围的提示词等。细节越丰富,提示词越多,生成的图片越好。(F11)

F16则逐步积累了适用于不同平台语境的提示词模板。“在问 ChatGPT 的时候,一定要任务明确,给它一些负面限定。然后通过角色扮演、反向 PUA 等策略激发它的潜力。如果是豆包的话,提示词一定要真诚、全面。”随后, F16 将通用提示词存储于不同平台的历史记录中,可供反复微调使用。

2. 个性化定制 workflow

如果说构建个人提示词库是对内容生成质量的持续优化,个性化定制 workflow 则是对交互流程的精细化管理。用户通过精准匹配多平台功能,有效整合差异化可供性,高效应对复杂的使用场景。例如,上文提及的 F8 就通过在任务执行中配属豆包和 Kimi,构建出一条跨平台协同工作链条。长期使用小红书平台的 F17 则分享了自己用 DeepSeek 和 Kimi 组合生成 PPT 的经历。这不仅能够极大提升工作效率,也有效缓解深度依赖单一平台带来的隐忧(F23)。

你只需要在 DeepSeek 里面输入具体的 PPT 需求,并让它以 markdown 的形式进行输出,就会有一个 PPT 的内容结构,然后你复制下来去 KimiPPT,用 PPT 助手,把刚刚复制的内容输进去,就可以一键生成 PPT 了。当然,和其他平台也可以组合使用,做各种思维导图、框架图等等。(F17)

总结来看,经历了“单平台接入”到“多平台切换”,用户逐渐从早期“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呈现出“智能游牧”这一多平台使用特征。它诠释着用户“逐网络而居,择平台而栖”的生存状态,^[41]目的是实现可持续的数字栖居。区别于碎片、短时、随机的切换,^[42]用户的“游牧”实现了短期流动与长期稳定的统一——既保持多平台即时调度能力,又形成相对稳定的使用惯习。随着大模型平台的持续演进,用户的“智能游牧”会紧跟技术生态动态调适、翻开新的探索实践篇章(F6、F13、F24 等用户接入 DeepSeek 后,逐步孕化出新的使用模式)。从个人意义上说,“智能游牧”的节奏、表现还受到年龄、所处城市、认知水平等因素的结构性影响。例如, F2 和 F27 分别是 50 岁的编辑部主任和五线城市的基层记者,她们对大模型技术的接入相对滞后,使用的平台也十分有限,但同样希望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中真正驾驭大模型。可见,用户的“智能游牧”行为并非同步、稳定的,当下的落后者在未来也有可能成为灵活的“游牧者”。

余论：“接入·切换·游牧”的治理启示

在当前大模型构建的智能媒介生态中,传统的“使用”“接纳”或“切换”等概念已不足以完整解释用户行为逻辑。本研究基于复媒体理论框架,从可供性视角系统揭示了用户从“单平台接入”走向“多平台切换”再到“智能游牧”的多平台使用行为驱动机制(如图 2),认为用户多平台使用本质上是持续追寻可供性资源的过程——可供性支持在哪,用户就在哪。

[41] 刘文静:《平台企业:零工经济中的法律关系与责任分担》,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第26-28页。

[42] 何康、张洪忠:《用户媒介使用:“高度集中碎片化”与“动态粘性”——基于手机应用切换的实证研究》,载《新闻大学》2023年第10期,第14-30+119-1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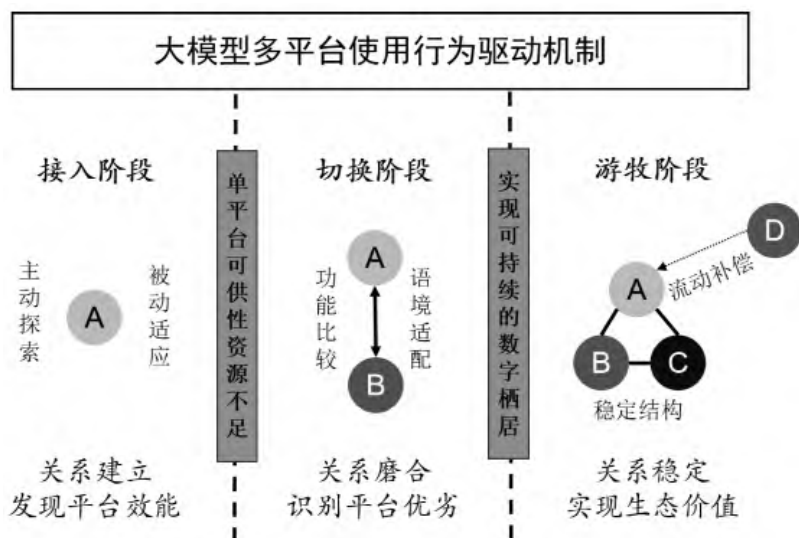


图2 多平台使用行为示意图

“接入·切换·游牧”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唤传统平台治理模式的转型。过去，数字化平台通过制度化架构强制用户遵循既定使用规则，其核心是借“平台化树”将用户生活限缩于单一技术系统中。^{〔43〕}此间，社交关系沉淀、数据资产积累等也在无形中为平台迁徙竖起围墙。而大模型平台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封闭性——由于不同模型的重复性、替代性增强，用户第一次获得实质性突破单一平台限制的可能，对大模型平台的使用法则就从形式载体的依附演变为多重约束下对结果效用的追求。

尽管本文将“接入·切换·游牧”基本视作用户积极的、能动的主体性实践，我们仍需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悖论。访谈中，多名用户从自身的使用体验出发，反思了游牧过程中可能存在平台依附、能力退化等风险（见表2）。F30坦言，“现在，即便我完成了一个初稿，还是会习惯性地喂给几个大模型，看看能不能进一步扩展。我总是会自我怀疑，会觉得不经过这个步骤，结果就不完美。”F20则将“英文水平退化”归结为大模型使用的“报应”，进而鼓励采取审慎使用和限制性使用等措施。

更进一步，看似自主的“接入·切换·游牧”也可能是技术系统与制度秩序精心设计的产物。随着大模型平台深入公共领域，公共管理者容易成为技术应用的“主导者”，建构起“技术大他者”的权威地位。在此语境下，用户的能动性受限于可供性的隐形框架，个体选择于无形中被宏观权力接管，讨论“是否使用技术”和“在多大程度上接纳技术”失去了实际意义。当技术抗拒在媒介化社会中既不可行也难以奏效时，用户表现出的“创造性”未必充分体现其价值，反而成为更深层主体性危机的遮羞布——所谓“最优选择”实则凸显了选择权本身的有限。

为充分释放技术可供性与用户主体性的互构活力，公共管理部门应当积极推动多个大模型平台与社会连接，培育多元平台生态，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空间，避免出现单一平台“霸屏”局面，从而更好地应对社会管理和用户使用中的差异化需求。同时，要加快建立适配性的法律法规框架，鼓励不同大模型平台开展“共生性合作”，形成良性的技术竞合关系。对大模型平台而言，需建立完善的风险披露机制，及时公开平台的性能局限与潜在风险，并通过引入第三方审查、算法审计等机制，有效防范可能产生的信息偏见、认知茧房和市场垄断等问题，切实履行技术伦理责任。对于

〔43〕 何塞·范·迪克、孙少晶、陶禹舟：《平台化逻辑与平台社会——对话前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主席何塞·范·迪克》，载《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第49—59页。

践行“接入—切换—游牧”模式的用户群体，则需要充分认识到多平台使用的战略价值——唯有保持使用的灵活度与批判性，通过调配多元平台的可供性资源，才能将“智能游牧”转化为真正的认知游牧，实现个体智识、个体创造的持续增值。

(责任编辑 陈夏红)

Abstract: Employing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is study uncovers a multi-platform usage trajectory through which users transition from “platform access” to “platform switching” and ultimately to a state of “intelligent nomadism” in the contex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Upon initial access to LLM platforms, users gradually form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ir affordances under both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influences. Subsequently, they engage in platform switching, seeking to maximize utility by selecting, comparing, and adapting to different platforms’ affordances. However, switching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Users seek to construct stable relationships within this fluidity and while leveraging mobility to compensate for limitations—aiming to establish a pragmatic and personalized form of digital habitation. Essentially, the trajectory of “access, switching, and nomadism” reflect an ongoing pursuit of affordance resources, signaling the need for a shift in platform governance paradigm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polymedia environment, affordance, large language model, multi-platform